

农民的需求与新农村建设

凤阳调查

Farmer's Wants and the New Country Construction

白南生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SAP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 Survey in
Fengyang

农民的需求与新农村建设

Farmer's Wants and the New Country Construction

凤阳调查

白南生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农民的需求与新农村建设: 凤阳调查/白南生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097 - 0562 - 9

I. 农... II. 白... III. 农村 - 社会主义建设 - 研究 - 中国
IV. F3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2813 号

农民的需求与新农村建设: 凤阳调查

主 编 / 白南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65595789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胡 涛 童根兴

责任校对 / 郭红生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19.6 字数 / 337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562 - 9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矍铄：杜老近照

白南生摄于2007年2月12日

改革先驅
杜同生
2008.4月

(杜老因本书为凤阳题词，时年九十五岁高龄)

杜老谈农民的需求与新农村建设*

(代序)

安徽凤阳是和我国的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的，而我国的改革是在危机中催生的。

1958~1978年这20年间，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政策和制度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最紧迫的是农业经济危机，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平均收入年增长只有1元；人口增长迅速，吃饭问题无法解决，人均粮食始终只有300多公斤，其中除了吃的口粮，还有饲料、工业用粮；8亿农民中，贫困人口占2.5亿；粮食不能自给，要进口。整个经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已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

—

1978年，我国农村开始探索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凤阳的小岗村也是在这场变革中走进人们的视野。改革开放的起初几年，全国上下沉浸在因这场生产关系变革而带来的巨大收获喜悦中。

然而，历经30年的改革发展到现在，农业、农村和农民并没有一直按照改革之初的速度发展下去，而是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甚至昔日迸发勃勃生机的农村成了被置于全党和全部工作中之重的“三农”问题之一。

* 此文为白南生、王平整理的杜润生同志就农民的需求与新农村建设相关话题发表过的若干谈话，经杜老审阅，并批曰：“已阅，可行。杜。”



中国农村建立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改造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变革。但是，变革微观经济主体，不能孤立起来进行，必须与其他相关制度联动，在改革整个制度环境过程中实现。而改革这个制度环境，诚非一举而得的事情。

现在，经过 30 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但是我们的农业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农村仍然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这表明我们现在还未摆脱二元结构，造成这种局面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

第一，几十年来，农民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农民想离开农村，改变身份，非常困难。这种情况全世界少见。

第二，农民不能享受和城市人相等的受教育权利。本来应该所有人都一样，但考大学农民子弟分数要提高。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70%，但在大学专科里却只占 30% 的份额。30% 的城里人占 70% 的份额。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没在农村建立。农村失业人口不叫失业人口，也没有失业救济。但农民却承担我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任务，以及为之后的城市化贡献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

第四，农民就业难，城乡差距近年来还有扩大趋势。农民种田收入低，在传统农区，农民除了温饱，难以承担教育、医疗、养老等负担。有 1.3 亿农民十几年来长期往返在城市乡村之间，来回流动。农民工的工资增收缓慢，衣食住行和教育医疗条件都不能和城市居民相比。

第五，土地制度。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土地问题，改造了集体经济，实行家庭承包制度，农民表示满意，符合他们的利益。但 30 年不变缺乏法律规范，也缺乏法律咨询组织。

第六，贫困人口大部分在农村，贫困线如果提高，农村贫困人口还将是一个巨大的群体，并且脱贫群体也不稳定，返贫现象到处可以见到，不可以盲目乐观。

第七，农民贷款难。和城市人相比，农民种田需要成本，但贷

款非常困难，国家规定土地不能抵押，而银行里规定贷款要求有抵押品。

第八，社会主义时代农民翻身了，废除了封建压迫，但乡村民主制度尚不完善，干群矛盾激化事件时有发生。村民自治尚欠规范化，乡自治还没提到议事日程。

如果要想打破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缓解“三农”问题，这些问题要认真面对，并且迟早要面对。

二

中国资源禀赋是人多地少，这是基本国情。农业离不开土地和水资源，人均耕地少，水资源分布不平衡，东部多西部少，南方多北方少，水土配置不协调。人均 1.6 亩耕地，实现发达农业、很快进到现代化不容易。

人多地少，只能通过城市化、工业化完成农村人口转移，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增强创收能力，扩大经营规模。

我曾接待过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他提出中国要重视发展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培育人力资本，使农民劳动效率和土地产出率同步得到提高，发展“劳动力密集 + 知识密集”型产品，加强国际竞争力。

农业产业化经营，实际上是将农业的产业链延长，将农业生产和产后的加工、储运、营销等工序结合在一起，并形成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领域有农工商一体化、贸工农一条龙、公司 + 农户、产业化经营等不少提法，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引进股份制，聚集资本，发展各种各类农产品加工和市场销售。目前，农村缺乏本土生长的金融组织，这种草根的金融组织亟待建立，以避免资金继续外溢。

为了应对国际竞争，我国的农产品需要不断提高科技含量，在农村一定要引进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如卫



星定位技术，可将每块农地的土壤化学成分清晰精确地测定、标明，真正做到因土施肥；也可将农作物的不同地块的产量、病虫害发生状况准确地监控测定，以便采取具体技术措施。信息技术还可以向农民及时提供准确可靠的、更为全面的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逐步发展电子商务。生物技术，包括细胞工程、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等，将使农产品的加工范围扩大。其中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动植物，更有广阔的前景，其对人类的影响有争议，可以加上特定标志，使消费者自己识别和选择。如果培育出抗自然灾害（冷害、干旱等）特性的转基因作物，会使我国西北地区农业生产出现一次新飞跃。

提出第三次浪潮的托夫勒认为，中国有 9 亿人还处于第一次浪潮，大量农民从事农业；有 2 亿~3 亿人处在第二次浪潮中，从事工业；只有 1000 万人进入知识经济的第三次浪潮。如果处置得当，中国有可能利用高新技术，将第三次浪潮同第一次浪潮结合，引发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扩大农业的规模。

全世界的农业，包括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都是以家庭农场为主要经营形式。家庭农场可大可小，农业机械具有可移动性，便于家庭使用，并适应土地的分散布局。美国的家庭农场，夫妻二人能经营几百英亩耕地。中国农村就算转移出去一半农民，土地规模扩大一倍，户均也只有 10~15 亩，谈不上大规模。20 世纪 50 年代，用集体经营取代家庭经营，未见解决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问题。农民有切身体会，知道老路走不通。家庭经营规模小，是事实，问题是怎么扩大。唯一途径是农村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农外就业。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扩大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农村劳动力减少的结果。

现在有人引用个别集体经济典型案例来否定家庭承包制的经营制度，这是不符合农民愿望的。我们并不偏爱任何一种经营方式，应当允许多种形式并存，只要能保证真正兼顾效率与公平，我们都赞成。今天的公有土地家庭承包制是农民通过公共选择的结果，事实证明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保持稳定。

三

今后新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取向，我认为第一是土地使用权长期化。如中央多次强调的，长期稳定家庭承包制，以鼓励农民利用好土地这一十分稀缺的资源，发展精细型农业生产。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应包括经营权、转让权、抵押权、收益权等，应作为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并对使用权的市场转让，制订法律程序。

第二，农村经济建设的核心是要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人多地少，只能通过城市化、工业化完成农村人口转移，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增强创收能力，扩大经营规模。现代化过程最基本最主要的人口变量就是农民进城变成工人、变成城镇劳动者、变成城里人。数以千万计的大规模农民工现象无疑是中国特色。重要之处在于怎样减少农村人口，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

第三，发展新的整合方式。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引导农民发展新的联合与合作，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既维护农民的个人财产，也发展集体资产和公共产品。这种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新的联合，可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第四，市场发育和农业保护。国家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支持，重点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水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激励各种经济主体发挥比较优势，提高比较效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第五，科技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人口多、资源少，农业应更重视科技进步，重视知识创新和生物技术、新能源开发、水资源开发和节约、海洋生物。既保护已有资源，又开发新的资源。不能以破坏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增长。

第六，民主和法治。要有准备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农村首先扩大基层民主，推行民主选举，实行村民自治。建立稳固的民主、



法治制度，吸引群众参加公共事务。

总之，我在 20 年前所担心的两个事我们现在仍然还在面对——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中国的“三农”问题千头万绪，但是这两个问题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

欠发达县域新农村建设的 困境与出路

范迪军*

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2005 年，全国县域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70.24%，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8.81 万亿元，占全国的 48.1%。但是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和谐社会面临的区域差距、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在县域层面体现得尤为突出。2005 年，百强县的行政区域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全部县域的 1.3% 和 7.7%，但其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分别占全部县域的 1/4 和 1/3 以上；从百强县的分布来看，88 个县分布在东部长三角区域。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在县，而县的主要任务又毫无疑问在中西部。作为欠发达区域的中西部县，能不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探索出一条经济发展又好又快路子，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我们以中国农村改革发祥地凤阳县为例，进行分析和探讨。

凤阳地处安徽的东北部，总人口 73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60 万人，2006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44.6 亿元，农民人均收入 3095 元（低于全市 138 元，高于全省 126 元），财政收入 2.71 亿元，全县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比分别是 32.5:34.3:33.2。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

凤阳在这种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范迪军，安徽省凤阳县县长，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学博士后。



中央提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而欠发达的中西部县普遍面临着工业不发达、城市经济也不发达的问题，如果仅仅寄希望于中央财政，恐怕是杯水车薪。如何走出困境？以凤阳县为例，我认为，第一，站在凤阳自身的角度，只有通过培育造血的功能，才能走出凤阳新农村建设的困境；第二，只有跳出凤阳的区域，才能发现自身造血功能不足的问题，必须从外部视角寻求新的造血的能量，走出凤阳新农村建设的困境。

从宏观经济看，我国现阶段在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两个过剩：一个是东部发达地区资金过剩，一个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过剩。这一对矛盾既表现为产能过剩，又表现为内需不足。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资源配置只有达到均衡，其产出效益才能最大化。而发展经济学已经证明，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毫无疑问，东部资本和中西部的劳动力资源如果能在新的区间进行优化配置，资源的边际效益必然会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为新农村建设带来一次机遇。为此，基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轨迹和凤阳经济实证研究，对新农村建设问题，本人大胆提出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第三次农村能量释放，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第三次繁荣的设想。

什么是农村的能量？我认为就是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经济发展的五个要素。这里还要加上一个特别要素——制度，这也是制度经济学的重大贡献。30年前，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发明的“大包干”，对人地关系进行了调整，突破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实现了我国农村以粮食产量巨大增长为标志的第一次农村经济繁荣。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能量获得了空前释放，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引发了卖粮难问题。为什么还是过去的土地，还是过去的农民，却有着不同的粮食产量？“大包干歌”把它总结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而从经济学角度看，实际上是制度创新带来的变革，即通过实施委托—代理的激励制

度，将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调整原来的利益分配制度，极大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使劳动力的能量得以释放。粮食产量的增长为农民带来了货币储蓄。货币储蓄如何转化为投资要素？同样，一个新的制度创新催生出来，民间金融开始活跃，农村基金会在全国各地农村兴起，大量的储蓄资金通过基金会就地投向乡镇企业，使民间资本的能量获得了空前释放，带来了以乡镇企业发展为标志的农村经济第二次繁荣。那么，为什么第三次能量释放和第三次繁荣至今还没出现呢？

1995、1996 年全国取缔了农村基金会后，农村储蓄全部流向了农业银行和信用社。由于农业银行推行商业化改革，大量的储蓄资本按照市场利润最大化规则投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农村信用社处于化解不良资产的高风险期，实行惜贷政策，造成乡镇企业资金链中断，农村的第二次繁荣夭折，这是国际金融理论提出的金融抑制的严重后果。2005 年凤阳县年末储蓄近 30 亿元，而贷款只有 17 亿元，近一半的凤阳储蓄受央行信贷额度限制没投到凤阳，而是通过商业银行投向了发达地区。2006 年，安徽省县域存贷差 1256.7 亿元，相当于存款总额的 50.5%。也就是说，目前金融机构在安徽县域的存款有一半流出县域。乡镇企业缺少发展资金，倒闭了，大量乡镇企业员工开始流向发达地区，使劳动力的本土就业问题演变为农民工的“盲流”、民工潮和劳动力转移问题。2006 年，凤阳 40 万农村劳动力中有近 20 万转移到发达地区。然而，这种转移虽然给农民增加了一定收入，但由于多种原因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富裕生活，农民种植收入仍然占六成之多，打工收入平均只占了两成。特别在国家实行粮食补贴政策后，农民打工数出现减少趋势。这种现象完全印证了黄宗智先生提出的拐杖逻辑理论。可见，外出打工并不能缩减区域差距。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发展并不是依靠自身的原始积累，而是借助了欠发达区域的储蓄资本、人力资本，特别是劳动力资源。例如，2006 年全国百强县第一县昆山市人口 66.7 万，而外来人口则有



73.5 万之多；凤阳人口 73 万，外来人口却不足 1 万，外出常年打工近 20 万。但是，昆山的 GDP 和凤阳的 GDP 却都是以本地户籍人口来统计的。打工农民把收入带回来，把 GDP 留给外地。2006 年昆山外来投资 54.5 亿美元，而凤阳 2006 年外来投资才 16.5 亿元；2007 年上半年，昆山外来投资 51.6 亿美元，而凤阳为 14.7 亿元（其中，省外资金 13.1 亿元）。昆山中专及大专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 46.5%，大学本科占 25.5%，研究生占 0.52%；而凤阳初中以下的人口达 80%。为什么全国百强县大都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这是有其内在经济规律的，除了区位优势禀赋的先天条件外，就是中西部农村的储蓄资本、人力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等，都在国家金融政策和沿海特区优先发展政策影响下“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五句话，其中从生产发展这一条来看，中西部农村就面临很大的压力。以凤阳县为例，现有的农业是传统农业，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一亩小麦净收入只有 300 元，水稻也只有 480 元。目前，全县 108 万亩耕地，小麦和水稻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 71%。这种生产方式和收入水平，农民生活质量如何改善？再看环境，由于凤阳除了“两石”（石灰石和石英石）外，没有别的资源可供开采。“两石”的大量开采，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繁荣，还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这种资源粗放型的经济也是与科学发展观格格不入的。

农民创造了大包干，创造了乡镇企业，那么，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我们能不能创造新一轮发展机遇？我们能不能创造第三次繁荣？用什么来创造第三次繁荣？我们有没有能量？我认为我们是有能量的。第一，我们的资本哪去了？如果农村储蓄全部用于农村投资，我们的经济会发展到什么水平？更确切地说，如果农民储蓄可以全部用于农民创业，农民是否都到城市和发达地区谋生？第二，劳动力资源。一半以上的最优秀劳动力从发达地区回来，我们的经济会怎样？第三，人力资源。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中专毕业生，现在 95% 到发达地区去了，农村培养了人才却无法使用人

才。这三个方面都是我们农村自己的能量，准确地说这些都是我们欠发达县流出去的能量。

欠发达地区发展的路径是什么？我想可以选择两种方式：第一种叫内生的方式，即靠自己内部的能量来发展。第二种叫内外互动型，也叫城乡资源对流型。但是无论是哪种方式，能量都不会自我释放，我们必须创造条件，营造能量释放的环境，即通过制度创新，消除能量抑制因素，使之在一个新的发展环境下，重新聚集，成为拉动经济的引擎。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内生的方式，主要有回乡创业和合作经济两个类型。回乡创业型是指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鼓励外出打工的农民回乡创业。我们农村的能量流出有三大块，即转移出去的资金、劳动力和人力资源。如果这些都能回来，我们就能够发展起来了。大学生到发达地区找不到工作，流落城市；农民在外地打工，很多权益得不到保护。如何让他们回来，不是我们农村马上就能解决的，需要宏观政策调整。第一是金融政策的调整，要激发现阶段民间金融的活力。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提出来了。据我们搞的“万户农民需求大调查”统计，农民用钱的70%靠亲友借款，10%以上靠银行贷款，还有10%以上靠借高利贷。因此，改革现有的官方金融制度，使金融资源向农村配置，或学习国际经验实行开放民间金融与农村政策金融相配套，实行优惠政策鼓励更多的商业金融向农村倾斜，为农民创业提供资金支持。第二是对农民创业要给出比城市创业更为宽松的环境。鼓励农民创业立足本乡本土，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管得太多，收费太多，农民创业环境如果不优化肯定会失败。我希望出台一个“农民创业法”，把农民创业的税费全免了；土地给一个特殊的政策，可以向银行做抵押。没有很好的环境，农民不会也不敢创业，就只好去外地打工。基于上述考虑，我认为，农村经济第三次繁荣的能量的释放就在于外流的资金、劳动力和农村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的回流。如果他们都能回来了，第一，

我们就能在农村搞产业化，只要搞产业化农村就有出路。小岗村搞葡萄一亩收入 2000 元，而种粮收入只有 600 ~ 800 元。一个蔬菜大棚要投资 1.8 万元，当地农民搞不起，必须依托金融支持或回乡人员创业。第二，我们就能搞乡村工业化，或者说是新型工业化。外出人员见多识广，他们可以和发达地区老板联手，也可以自己创业，以农产品深加工作为龙头产业，发挥当地比较优势。凤阳县正在规划建设中小企业创业园和经济强镇创业园，鼓励和引导农民回乡创业，目前回乡参与创业者十分踊跃。第三，新型城市化，即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农民有钱了，以后可以到小城镇建房，建经济房、别墅等，可以改水、改厕，美化环境，可以享受城市的自来水、有线电视和娱乐生活等。如果这些都实现了，农村经济必然会出现第三次繁荣。这也是我所说的农村内生模式的繁荣。

2006 年以来，小岗村先后来了 18 位大学生前来创业，这对农村来说是个新鲜事。我认为这就是人力资本的回流，这些大学生都是农民子弟，他们受到高等教育后回到农村，必然把新知识、新理念带到农村，只要创业环境宽松，他们一定会在农村将书本知识转化为新的农村经济，这是新型农民，也是建设新农村的新生力量，必然会为新农村带来新局面。我们也希望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在小岗的双孢菇大棚能够为凤阳发展现代农业起到成功的示范作用，带领农民走上致富新路，吸引更多大学生投身新农村建设。

在鼓励资源回流的同时，我们还尝试资源的整合或联合创新，鼓励一家一户通过生产建立合作社，发展合作经济。凤阳县去年以来农民合作社已经有 126 家。这种合作组织，不仅有效地解决大包干生产方式对接大市场的交易成本过高问题，而且引发了农村劳动力的分工与合作，使农村资源得到新的优化配置。

以上是在市场配置资源下的依靠农村原有的内生变量求解方式。除了自身力量外，我觉得现阶段，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引导，可以实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优势互补，包括城乡资源的

对流，即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富余资本、人才、技术等流向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打破，但是，这种打破是单方面的农村资源流向城市，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如果是双向流动会怎么样？这就是我要说的通过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通过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通过城市和农村共同作用，实现资源对流互动发展的新模式，从而创造农村经济的新的繁荣局面。这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外互动型发展方式。

能不能把东中西部地区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东部地区资本、人才富余，技术领先；而中西部地区土地、矿产资源和劳动力相对富余，两地资源如果对流，建立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共同配置的合作经济模式，从理论上说，这也符合“产业梯度转移”的经济发展规律。这种合作不是过去那种富帮贫的单项获益形式，而是建立在优势互补的双赢发展基础上的，是可持续的，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凤阳地处中部地区的东部，历史文化、农业和矿产资源丰富，具有承接东部转移产业的区位优势。但是，让政府和东部企业一对一的谈产业项目转移问题，成本很高。我想，能否通过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来进行整体性的有序转移，从而在中部地区建立两地合作的“飞地”经济？目前国与国的合作有新加坡和我国合作的苏州工业园，省内如江苏江阴与靖江合作的靖江工业园，但跨省的区域合作还没有。为此，凤阳县在飞地经济上做了大胆的尝试，并于5月22日在上海通过了专家评审，当日与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联合进行了专门推介发布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上海有关区域已与我县就飞地经济正在洽谈合作，双方都认为是优势互补。这种飞地模式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建设新农村的思路。

从目前中西部县域发展的实际来看，拉动经济发展的路径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工业化战略，而在工业化战略中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招商引资。这些做法并没有偏离科学发展观，欠发达区域发展的主